

OLD PHOTOS

「老照片」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又是北山落雨时 崔武年
永远的南中国海 郑仿健
「军管」时代的终结 周孜仁
抗日名将张灵甫 胡剑
优雅战争 杨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照片.第76辑/冯克力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74-0327-3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历史: 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5971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203毫米

6印张 126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

品,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尹奎友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目 录

崔武年	又是北山落雨时	1
郑仿健	永远的南中国海	30
郭 军	我所知道的基建工程兵	42
周孜仁	“军管”时代的终结	52
肖恩源	黑龙江大桥纪事	57
周 杰	一件往事	63
史耀增	丰收的喜悦	66
林冠珍	袁世凯“总统图书馆”馆长孔天增	71
胡 剑	抗日名将张灵甫	78
王端阳	父亲王林和虞运周	89

胡耀萍	我的父亲胡萍	97
何 蜀	爱唱歌的母亲	114
杨 威	优雅战争	126
赵海成	1935年：天津的白俄军官学校	134
谭金土	清末的苏州女教师	140
伊 格	1930年代：日本福岛高等商业学校剪影	143
连永升	话说胶东“轱辘”	153
李佳达	绍兴酒的传统酿造	156
潘玉陶	山河破碎的童年	165
岳青凤	我家的“全家福”	171
李亚江	天安门前的合影	180
李宏荣	我的第一张照片	184
冯克力	父辈们的事功与命运	187
封 面	“一战”的法国明信片（马良）	
封 二	山东牟平的古城门（秦风老照片馆供稿）	
封 三	山东莱州城俯瞰（秦风老照片馆供稿）	



又是北山落雨时

——说说我的父亲崔健

崔武年

我的父亲崔健，是1949年5月从山东南下到浙江的——那一年是国共两党龙争虎斗、胜负两分的一年，是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中国社会行将定格的一年——就从这一年开始，那个大开大阖的时代变革把成千上万的像我父亲这样的从山东到浙江的南下干部变成了“浙江人”，同样，通过“南下”，把更多的山东人、东北人、河南人、河北人变成了“上海人”、“福建人”、“贵州人”、“广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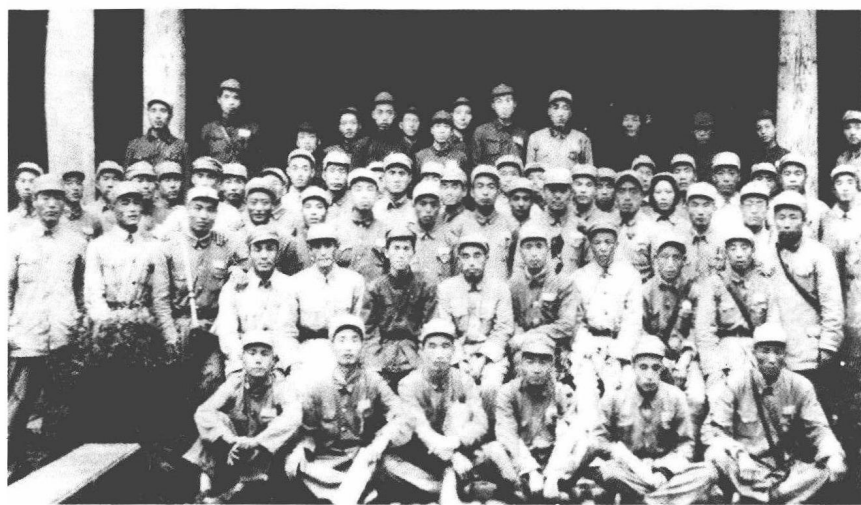
父亲是2001年5月在浙江过世的。在世的时候，父亲经常说真应该好好写写那些“南下干部”——他说他们当年大多都是二十岁出头、二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组织上一声令下，他们就无条件地打起背包，靠着两条腿，跋涉几千里，一边学习，一边打仗，一边行军，组织上说到地方了，他们就无条件地放下背包，就去工作，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剿匪反霸，搞土地改革，搞工业化，等等。他们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干就是一辈子！到了浙江的，就把全部的青春、整个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浙江这块水土！现在，大多数人都故去了，活着的，也都是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了；故去的都葬在了浙江，活着的，也不

会离开浙江了！父亲说：“这里面是贯通着一个精神的，这个精神就叫‘南下精神’，像这样的‘南下精神’应该好好地宣传宣传！”——当然，这里说到的“南下精神”只是信笔提到，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我是说，正像他的成千上万的南下到浙江的不是浙江人的浙江的老战友、老同事们一样，那个巨大的变革的时代一下子就把我父亲这个山东人定格为“浙江人”了！

又是春天了，又是北山落雨时。到5月26日，父亲去世就整整十年了。我们把父亲葬在了丁桥的一个民营公墓里，没有去省里的“八宝山”——南山公墓——我和妹妹去那里看过，我说那里太挤了。雪白叶黄，花红天蓝，我只要到杭州，就要去看看父亲，我很想父亲。无谓时间的推移，我对父亲的思念像绵绵的雨丝在我的内心世界中间无休无止地飘洒着。我越来越经常地记起培根的那句名言“德行有如宝石，朴素最美”，我觉得那真像父亲。你说我对父亲的思念仅仅是父子亲情所致吗？肯定有血缘关系的作用，但是，也不仅仅如此——父亲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个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亲身经历了中国数次伟大的革命性变革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确有着很多珍贵的人生体验和政治阅历。

因此，我愿意说说我的父亲。

浙江的“老人”都知道，父亲其实是两到浙江。第一次是前面说到的，1949年南下，到1954年离开，总共工作了五个年头，先后做了建德、金华、温州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后来又到省里管了一年多的工业。第二次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百废待兴，人事调动频繁，1978年陈伟



1949年5月初，刚到浙江建德的华东局南下纵队七大队的部分干部合影。
二排右四为崔健。

达调去天津，省委缺一个管工业的，父亲愿意回来，中央也同意。1979年定的事，1980年父亲才从驻突尼斯大使的任上回到浙江——那时，他已经六十二岁了。记得父亲表现出来的“叶落归根”的感觉非常强烈，他说：“这次回浙江就不动啦，就算是回家啦。”一般来说，父亲喜怒溢于情表的时候不多，但是在决定回浙江工作的时候，他真的很快乐！后来，父亲跟我说，他愿意回浙江工作，1957年浙江就要他回去，结果服从组织去了大连。父亲说：对浙江他是有感情的，过去也有不错的工作基础，当年一起南下的同志大多都在，情况也还熟悉。另外，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各地都有一些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干部队伍内部的隔阂和积怨一类的问题，浙江也不例外，而他离开的早，没有掺和当地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以

比较超脱，好工作，等等。那时也有一个说法是让他去青海的，后来讨论时否掉了，主要考虑也不外是这些原因。父亲说：这也是中央有关领导和他谈话时重点强调的一条。那时，父亲那辈人已经叫那个什么“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闹掉了生命中最好的十年，他们除了急于把握余生再多做几年工作之外，还企求什么呢！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地注意过父亲的为人啦、行事啦什么的，那时觉得一切都很平常，平淡无奇；父亲去世以后，他那总是浮现在我眼前的音容笑貌也依然是十分的朴实无华。现在想来，一方面，作为一个个人来说，父亲确实应该算“芸芸大众”中的一个，他身材中等，相貌平平，没有什么特殊的性格魅力，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和特长，能律己，不张扬，处世低调，很好与人相处。他生活上要求不高，穿戴不讲究，吃饭非常简单，朴素得近乎贫寒，身上总能表现出一点农民的固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老一代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父亲倒是具有某些典型的普遍性：他组织观念很强，党性意识很强，一辈子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特别是建国以后，差不多每次大的干部调整，他都有份——我说，如果那个时候共产党有一个“抢险救火队”的话，父亲应该算一个常备的成员——比如，“一五”之初，全党大办工业，他主动要求“转行”支援东北的工业建设，而当时，他已经是全省总共十二名省委委员里面的一名了；1957年“反右”以后，中央决定“加强高教战线”，他虽不很情愿，但仍然坚决地服从组织需要，去他一点也不了解的大学工作；1964年，他又被调外交部当大使，前后虽然拖了快一年，但还是按照组织的要求来到



第一张全家福，1952年摄于温州。



1971年，崔健（左）在大寨参观。

北京，而且以四十七岁的年龄，从字母和发音开始进外交学院学习外语。在工作岗位上，他也是尽职尽责的，像他的很多同辈人一样，他没有专门的系统的专业知识，但他努力地以他的责任心和实际经验弥补了这些历史造成的缺陷。父亲属于那种“只会工作，不会享受”的类型，他不收藏什么，也不保存什么，娱乐休闲视条件而定，开会、听报告很少做笔记，就是晤见很重要的领导人也没见他用笔记过什么——父亲去世以后，我曾经翻过他留下来的一些笔记本，没有一本是用完的，每一本都是写了十几页、二十几页，有的才几页，每一页又都是写了几行字，没头没尾，无延无续——但是，回来传达、贯彻又能做到基本上不走样，等等，等等。总之，用我近距离的眼光看，父亲在“共产党的老干部”里面真的是再普通不过了，甚

至普通得有些平庸。从他的嘴里，听不到什么生动的“革命故事”，听不到他和某位或某几位中央领导的“私人交往”，更听不到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能显示父亲个人的性格魅力和政治智慧的“二三事”！呵，父亲，按现在的“标准”，你在1939年底就算是个“地级干部”了，又是“七大”的五百五十四名正式代表之一，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呆了四年多，从头至尾参加了“整风运动”，从毛泽东开始的所有中央领导的报告、讲话你都是亲身与席、亲耳聆听——但是，你说起“七大”，说起延安生活，也就是十分简单的寥寥数语。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弟弟、妹妹都问过父亲，想请他讲讲“过去的故事”，特别是讲讲“整风”，讲讲“七大”，讲讲延安时期的生活细节——一位知名的外国传记作家说过：“要注意对细节的发掘，因为细节对描绘人的性格和能力有着特殊的意义”——问急了，他也就是说：“没什么嘛，就是和徐运北、姚仲明几个人吃过几回红枣炖鸡嘛！”再问，就问不出什么了。唉，父亲！我能说什么好呢？你参加革命虽然基本上是在共产党进入“成熟时期”以后，但是世事艰难，树静风动，领导人“成熟”之后的“躁动”，更是会令全党乃至全国举座不安！所以，你也应该有一些难忘的坎坷吧！你入党以后虽然基本上做的都是地方党政工作，但是你拉过队伍，打过游击，开辟过新区，创建过政权，后来又办过工厂，管过高校，还当过大使，更何况地方工作又是多么的复杂丰富、头绪纷繁——你总该有些类似于“传说”类的故事值得叙说一下的吧！在老干部中间你不能说没有文化，但是又不能说你有很高的文化；你的职务不能说不高，但是事实上你又是几十年在一个职级的平台上转圈；你是忠于职守的，但是你又从不做过火的事；多年

来“运动”频仍，不能说你没整过人，但是又从没见过有哪一位挨整的记恨于你！你刚刚离休的时候，我曾经邀请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帮助你写写回忆录，但是终于没有写成——的确是写不成的，你没有一本日记，没有一点当年的资料，你过去的哪怕是应时的文章、报告，甚至“检查”、“交代”，你手头都没有留下一篇！你连一封能够引起一点回忆的私人信件都没有留下来——你不知何时养成的“坏习惯”到最后也没有改变：不管是谁写的信，是什么重要的信，你都是看完就撕掉，从不保存。你是第十二届中纪委委员，后来又是全国政协委员，据说，中纪委开会，你基本没发过言；政协每年开会，你没有一个是提案！几十年的沧桑，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你只是在你的心里“过电影”，而不会再刻意地对人提起，更不愿在“有谓”的场合做无谓的表现！有时候，一定要你说说你的经历，你也就是报报你的简历就完了，而这些东西的数量和你在组织上让填的表格基本相差无几！像这样写回忆录，就是手握马良的“神笔”也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有一件事父亲说过多次。父亲说，从总体上说，他这一生还算是顺的，参加革命六十多年来，除了“文革”那一段，他基本上没挨过整，“不像彭老（指他的儿女亲家彭瑞林），革命一辈子，有半辈子挨整，国民党的监狱蹲过，共产党的监狱也蹲过，蹲的时间还更长！活过来，苦哇！”父亲说，共产党的运动多，他只是在1938年当县委书记时因“执行上级指示不力”受了个“警告”处分，后来的历次运动都没有被迎头“运动”过。我问他：“过去都说是‘战争的幸存者’，那么，照你说来，还应该有个‘运动的幸存者’啦？”我



1972年3月，作者和父亲合影。

的话里有点调侃的味道——对过去的“运动”，现在的人们大都是鄙视的——我的心里还有没有说出的语言，那就是：“你没挨整是不是因为‘紧跟’啊？”但是父亲没当回事，他回答得很快：“那当然。”当时他神情认真地坐在沙发上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十八九岁，除了村子，最大的地方去过的就是县城，知道多少马克思主义？懂得多少‘党内斗争’——还‘路线斗争’？那时候救亡是第一位的，革命就是救亡，救亡就是革命，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就是打日本、救中国！那时候接触的共产党员说的革命道理，最打动人的就是抗日救亡，其他的都在其次。像我这样的还算是读了

几年书的小学教员，还知道有‘欧罗巴’、‘美利坚’，还知道个‘德先生’、‘赛小姐’，那时候拉起的游击队、建立的党组织，大多数成员都是一天书没念过的，不用说上海、北平，连个济南市、泰安府都没听说过的，那是大有人在！怎么办？就是跟嘛！先是跟着打，跟着干，跟着工作，后来就是跟着学习文件，跟着学习政策，跟着开会，跟着‘运动’，一个字，就是‘跟’啊！”父亲的神情有些黯然，他又重复了一句：“跟啊！跟上面的政策，跟上面的指示，跟上面的精神，当然，也跟上面的‘运动’，几十年来，就是这么跟过来的！”他看见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又接着说下去：“开始时是你不懂，不知道，不跟不行；接着是你知道了，懂了，你不跟就更不



1974年6月，崔健（左二）陪同民主也门国务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左三）视察中国援建的纺织厂。

行了！那时候斗争残酷啊！像1939年的湖西‘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枪毙了多少人！承认是‘托派’的很多都活下来了，坚决不承认的都被枪毙了！惨哪！幸亏罗（荣桓）帅纠正得快，我们那个地区和湖西紧挨着，我们刚开始就停止了。后来想想，那次要这么搞下去，我就很难幸免！为什么呢？一是我多少也算个‘知识分子’，还教过一两年的书，是‘肃托’的重点，二是我那时年轻气盛，工作也不错，叫我承认是‘托派’，那肯定是不可能的，这就有丢命的危险！第三呢，我哪里知道党内斗争这么厉害？今天是党内同志，明天就可能是‘阶级敌人’，就会被不明不白地枪毙掉！”

父亲仰面朝天，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声音慢慢暗哑下来。但我还是不依不饶：“爸，就是说，那次你要是遇上，你可能就不跟了？不跟你可能就倒霉了？”父亲十分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我又接着盯问道：“你从此以后就总结了一个‘跟’字？就‘跟’了几十年？”父亲看了我一眼，有些不高兴，但他说话的声调仍然是平和的：“也不是‘从此以后’。这个‘跟’是几十年以后的总结，是几十年以后看回去。我们当年拉队伍，最初参加的还是念过几年书的多，但我们说到底也都是农民的儿子。现在活下来的，能做到相当一级干部的，说到底，也就是一个‘跟’呵！正确的跟，错误的也得跟，理解的跟，不理解的也得跟！能跟过来，跟到最后，跟到革命胜利，跟到精神上的‘自由王国’，不容易啊！”

这次不经意的谈话，让我后来回味了好长时间。过去都说老干部是“战争的幸存者”，我父亲说还是“运动的幸存者”，而且他就是“运动的幸存者”，而且他这几十年主要就靠“跟”才走到了现在！这的确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一个

“跟”字道尽了父亲那一辈人的无限沧桑和后人的无限感慨！是的，除了中央的那些制定路线、决定大局的领导集团之外，下面的成千上万的老革命、老干部们不就是“跟”吗？不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跟”、前仆后继的“跟”吗？没有这“成千上万的‘跟’”，没有这“几十年如一日的‘跟’”、“前仆后继的‘跟’”，能有革命的成功吗？能说父亲那辈人是碌碌无为的一代人吗？当然不能。他们那一辈人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历史上的际遇和作为，不是随便哪一代人能够望其项背的！能说父亲那辈人是除了“跟”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懂、甚至什么思想也没有，只是偶然地遇上了马克思主义、遇上了毛泽东，就成就了不世伟业吗？肯定不能。他们那一辈人里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独有的优良素质，否则不会只有他们在血与火的搏杀之后剩余下来！但是，我相信，我真的相信，他们那辈人，是真的不只是“战争的幸存者”，而且还是“运动的幸存者”的！现在，谁都知道共产党的“运动”多，谁都知道这些“运动”对人性的摧残不亚于战争对生命的剥夺，父亲那一辈人在经过这些“运动”的冲击、考验、淘汰，以至驾驭甚至投机之后幸存下来，修成了“正果”，他们真的主要地确实是靠“跟”才走过了那个年代，才走到了现在！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建立了一些丰功伟绩，可是他们也做了许多的错事和傻事；所以，后来他们既得到了人民的赞颂，又受到了历史的教训——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哦，父亲那一辈人！我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你们所背负着的无奈的局限——这个局限是历史的局限，既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记，又打上了你们所从属的政治集团的烙印——但是，这却一点也不能遮盖你们身上那已经被历史铸就了的光辉！



1976年9月，崔健在中国驻民主也门大使馆举行的毛主席追悼会上。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亲已经调到了外交部。开始被派到北京的大学里当工作组组长，也就忙了个把月吧，很快就没事了，可是没多少天又不可避免地被揪回大连批斗了——这些倒是都不算什么，因为这是当时的老干部们都难以逃脱的。

父亲遭受的最大折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当时，他无端地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天天是大会小会批判和没完没了的检查。那时候我正上中学，是住校生，也忙着在“文革”的水池里“游泳”，平常很少回家。后来几次回家都看不见父亲，就有些奇怪，一问母亲，才知道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我一下子非常震惊，不禁高声问道：“凭什么？凭什么？爸爸既没被捕过，又没脱过党，历次运动都没事，凭什么？他们凭什么？”但是不管我是如何的愤愤不平，在1967年里，父亲基本上就没有回家，而且为了整父亲方便，还早早地就把母亲发送去了黑龙江的五常农场（当时还没开始叫“干校”）！